

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行动逻辑*

石越 王小林

(复旦大学六次产业研究院,上海 200433)



内容提要: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如何扎实有效地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时代命题。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有机结合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本文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投入机制角度出发,基于微观层面对企业如何推进共同富裕进行了探究。首先,本文对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企业推动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进行了系统梳理和阐述。其次,对企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范式进行了解构,辨别和评估了其合理性、有效性及潜在风险性。通过对现有范式的深入剖析和反思,本文提出并建构了一个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概念。最后,本文以实现农业农村共同富裕为切入点,结合具体实例对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行动逻辑进行了梳理和论述。本文认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可以从培育欠发达地区市场、助力乡村振兴及提升地区公共服务供给三方面着手,在创造和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同时,提高社会的整体福祉,从而形成在“利己”的同时“利他”的良性发展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现代化 共同富裕 乡村振兴 企业价值投资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5766(2024)12—0005—16

一、引言

自党的二十大以来,如何推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和共同努力的目标。虽然,学界已经从宏观经济层面(黄群慧,2023^[1];司聪和任保平,2024^[2])和产业层面(韩保江和李志斌,2022^[3];季小妹等,2024^[4])进行了详细且缜密的论述,但是从微观层面剖析市场力量如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研究还相对较少,特别是对于企业如何参与推进面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讨论,仍主要围绕企业社会责任及相关概念展开。不可否认的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为我国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和共同富裕阶段性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有效的助力和支持。但需要说明的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项非强制性任务,且与企业以盈利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创立初衷与目的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因此,随着我国脱贫攻坚圆满收官,推进共同富裕实践迈入新阶段,如果对市场力量的挖掘仍仅停留在企业社会责任层面,极有可能出现市场在推进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的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后续动力

收稿日期:2024-07-18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多维视角的2020年以后我国相对贫困问题研究”(19ZDA051)。

作者简介:石越,女,博士后,金融学博士,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与公司治理,电子邮箱:yueshi_sy@fudan.edu.cn;王小林,男,教授,博士生导师,经济学博士,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贫困治理与国际发展,电子邮箱:wangxiaolin@fudan.edu.cn。通讯作者:王小林。

不足的问题。显然,这也并不符合我国深化改革开放、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那么,是否有一种或一类方式,能够在保证企业正常运营、完成盈利目标的同时,有效激发企业参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内生动力,从而让市场力量成为支持共同富裕目标实现的长期动力?

基于以上思考,本文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对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演化和理论逻辑进行了梳理,对现存问题进行了剖析,并对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现有行动范式进行了解析。本文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以超越现有范式为目标,提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企业价值投资范式,即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概念框架和行动逻辑,旨在激发企业向善投资的内生动力,并通过与社会产生双向互动的方式形成企业与社会间的价值共创,从而助力推进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三点。首先,本文对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必要性、重要性及有效性进行了基于历史演化和理论逻辑的解析与推导,对推动和实现共同富裕的相关研究进行了基于企业行动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其次,本文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为前提,结合目前我国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现有范式存在的问题以及企业的现实困境,提出并构建了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价值投资范式,即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最后,本文通过理论和案例相结合的方式对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投资方向和行动逻辑进行分析,为更有效地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提供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思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逻辑梳理

1. 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历史逻辑

从1955年毛泽东同志提出“共同的富”“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5];到1978年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6],以及此后他多次强调“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7];再到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的2035年远景计划中的“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这一理想贯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自成立到高速发展的奋斗历程。为了更快更好地实现这一百年奋斗目标,党和国家在发展的道路上逐步将共同富裕作为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国家发展目标(李实,2021)^[8],并为之努力奋斗。

然而,作为一个逐步递进的目标,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艰巨且复杂的任务。因此,它不仅需要党和政府的努力,更需要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通过合力打好国民经济发展“组合拳”的方式,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发展。纵观我国自1949年以来的发展历程,企业一直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坚力量。截至目前,我国企业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程大体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在不同的阶段下,我国的各类型企业在不同政策的引导下,为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做出了显著的直接或间接贡献。这些贡献不仅为我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我国长期坚持城乡协同发展,实现全体人民的富裕提供了有力保障。

(1)起始阶段(1949—1977年)。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民经济十分脆弱。为了更快地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党和政府采用了计划经济体制,并针对城镇和农村不同的发展需求,采取了着力发展工业和实施土地、农村合作化等制度化改革的差异化战略措施(李先军和黄速建,2019)^[9]。城镇中,迅速崛起和壮大的工业企业,在为城镇居民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的同时,也为提升我国城镇居民收入、解决温饱问题创造了条件和保障。农村中,各地农村合作社的创办,在有

效改变了农村传统生产方式的同时,提升了其组织化程度,为我国农村地区后续的多元化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总体而言,虽然在这一阶段,国家整体经济的落后,使得无论是城镇工业化的推进,还是农村经济体制的改革,都没能从本质上改变国家的贫困状况。但工业企业和农村合作社的迅速兴起与发展,仍极大地改善了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和经济状况,其经营创造的经济价值也为我国摆脱贫困,实现国民经济稳步发展奠定了根本的物质基础。

(2)培育阶段(1978—1993年)。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实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我国逐渐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我国的乡镇企业迅速崛起。蓬勃发展的乡镇企业在大规模带动农村地区人员就业的同时,有效提升了农产品交易频率和交易范围,显著增强了我国农村地区的经济基础。而这些现象也证实了企业,特别是乡村企业的益贫性,同时也侧面证明了企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有效性。然而,仅依靠乡镇企业的益贫属性并不足以化解我国改革开放后城乡间、东西部区域间发展的巨大差异。为了更好地利用和放大企业在解决贫困问题、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中的作用,1986年1月中央一号文件提出“鼓励发达地区到贫困地区兴办企业”,而这一政策也正式开启了我国企业通过帮扶的方式参与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篇章。

(3)开发式扶贫阶段(1994—2010年)。缓解和消除贫困,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首要条件。为此,我国于1994年3月起开展了有明确目标、明确对象、明确措施和明确期限的扶贫工作,即《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通过开发我国乡村地区的自然资源、建设贫困地区种植业和养殖业在内的农业产业,辅以贫困地区劳动力向外输出和易地搬迁的方式,最大程度地开发式解决我国农村地区的温饱问题。

随着2001年国务院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提出“鼓励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参与扶贫开发”的政策,我国企业也正式从探索式扶贫转向了开发式扶贫。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时代背景下,我国东部沿海城市企业通过吸纳边远及贫困地区劳动力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贫困人口就业问题,促进了我国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同时,随着农民工大量进城务工形成的知识积累效应,也为进一步推动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可能性。此外,自2005年起出台的《关于共同做好整村推进扶贫开发构建和谐文明新村工作的意见》《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等多个引导企业积极参与扶贫工作的政策性文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展包括建设农村基础设施、帮扶乡村特色产业发展在内的多种类、多维度扶贫项目。由此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开发式帮扶机制,为我国解决贫困问题,打好共同富裕基础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助力。

(4)精准扶贫阶段(2011—2020年)。随着2010年年底贫困地区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我国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阶段性目标也从解决国家“底线”贫困问题逐渐转向了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国务院2011年印发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明确指出,“稳定实现扶贫对象不愁吃、不愁穿,保障其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住房”是我国到2020年的总体目标,同时强调,通过扶贫进而消除贫困仍是我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国有企业应承担定点帮扶任务,民营企业也应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通过多种方式参与国家的扶贫开发。

在此背景下,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湘西考察时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的概念。随着精准扶贫工作机制的建立和实施以及脱贫攻坚战的开始,我国的扶贫模式从粗放扶贫全面转向精准扶贫。脱贫攻坚期间,我国企业通过精准扶贫模式在解决绝对贫困问题、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经济和社会力量。截至2020年年底,我国的央企完成了248个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的全部帮扶工作,累计直接和间接投资超1000亿元,其中无偿帮扶资金投入超540亿元

(国务院国资委党委,2021)^[10]。我国的民营企业通过“万企帮万村”行动精准帮扶乡村超13万个,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村7.32万个。累计安置就业90.04万人,技能培训130.55万人,并带动和惠及超过1800万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实现脱贫致富^①。换言之,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核心载体,企业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最重要的支柱之一。

(5)投入机制完善阶段(2021年至今)。2020年年底,贵州省最后一个贫困县实现了脱贫摘帽,这一成就标志着我国实现了消除贫困的阶段性目标,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上迈向了新的征程。“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②成为了新征程下的新目标任务。面对新阶段更为多元和复杂的任务,活跃的市场经济仍是推动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体制基础。同时,如何通过引导企业行为,改革和完善我国企业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投入机制,进而更充分地发挥市场经济体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公平性、充分性和高效性优势,成为了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

2.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理论逻辑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征之一。理解和把握共同富裕内在逻辑及其含义,是有效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路径之一。从共同富裕的字面来看,其主要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共享”,二是“富裕”(李实,2021)^[8]。但是,无论是共享的富裕,还是富裕的共享,其先决条件都是富裕。没有富裕,也就没有共同富裕。虽然,富裕仍可以拆分为物质维度上的富裕和精神维度上的富裕,但正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1]一书中指出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稳定发展的国民经济,是扎实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石和重要先决条件。

从宏观层面来讲,近年来国际经济呈现出逆全球化趋势,国际经济循环速度明显放缓,因而扩大内需,激发国内市场活力,成为了我国国民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的关键。因此,通过深化供给侧改革,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任保平和王子月,2024)^[12],是夯实我国物质基础,进而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任务之一。从中观层面上讲,18世纪60年代的工业革命是将世界经济推向现代化的原动力,而我国也是在工业化进程中实现了从低收入阶段转向中等收入发展阶段,并即将迈入高收入发展阶段。然而,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度推进,世界经济格局也发生了重大改变,新一轮的科技变革,使数字信息和人工智能等成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因此,从中观层面来讲,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并通过促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方式,进一步增强我国各个产业的产业链韧性,从而更好地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提高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进而有效推动实现共同富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引擎。

然而,无论是宏观层面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还是中观层面上新型工业化体系的建设,都离不开作为经济微观主体和现代工业体系基本单元的企业。作为创造财富的主体,如果企业活力不足,固步自封,那么产业现代化建设也不会取得实质性进展,甚至国家的发展也将受限。如果企业仅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唯一追求,共同富裕目标则无法实现。因此,无论是从发展生产、“做大蛋糕”的逻辑出发,还是从共同富裕的逻辑出发,企业都是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的重要参与者和实践者。

^① 数据来源: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万企帮万村”,书写脱贫伟业的民企华章[EB/OL].https://www.acfic.org.cn/ztzlzh/wqbwec/xddt/202103/20210301_104890.html,2021-03-01。

^②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三、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存问题

如上文所述,我国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通过积极动员企业参与各类扶贫工作,形成“超常规”的“战役式”社会帮扶机制(涂圣伟,2020)^[13],取得了现行标准下 9899 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伟大成就,实现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目标。然而,随着推进共同富裕工作的逐步深入,如果对于企业力量的引导和挖掘仍然停留在现有层面下,极有可能出现企业推进共同富裕后续态势疲软的问题,从而导致市场力量支持共同富裕实现的长效、常态化机制无法有效建立。基于此,本文尝试从内生动力不足、现有模式潜在风险、当前评价体系局限以及暂无标准化企业行动方案四个维度对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现存问题进行分析 and 讨论。

1. 现有模式下的内生动力不足

截至目前,我国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方式主要是以扶贫和针对性帮扶为主。然而,企业扶贫行为因其具有的政府主导、不计企业财务收益等特征,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企业社会责任(柏淑嫒等,2023)^[14]。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一种源于企业与社会之间关系而产生的概念,其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让渡部分收益用于公益以及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这种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与企业追求的以商业运营效益和股东利益最大化的根本目标相悖,使得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积极性有限。同时,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推进共同富裕的表现往往与企业内部文化及其管理者的经营理念有直接联系。以新希望集团为例,作为我国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其自 1994 年起开展的各类面向老少边穷地区的帮扶项目离不开其创始人刘永好对“义利兼顾,以义为先”这一信念的坚持,更离不开新希望秉持的“阳光、正向、规范、创新”的企业文化。然而,由于我国许多国家级重大项目仍存在明显的准入壁垒,使得许多企业特别是中小型民营企业,很难参与到这类项目的建设,造成经营者对于企业在国家建设中社会价值的认知受限,进而进一步削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自驱力。

2. 现有模式中存在的风险

随着社会的进步以及社会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这一概念认知和理解的提升,许多企业将承担社会责任作为一种经营战略,通过迎合政府和公众的期待进而提升企业形象并获得更高的企业财务绩效。然而,当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成为企业的一种合法的逐利工具后,会存在一个非常大的社会隐患,即企业可能会通过“漂绿”“虚报”等方式向社会提供“经过美化”后的社会责任表现,以获得更高声誉和更好的企业形象,从而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和财务表现。事实上,近些年来,企业“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屡见不鲜。这些问题的出现,在直接造成社会整体福利损失的同时,也降低了企业的社会信任度,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社会责任在推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的可靠性及贡献率。

3. 现行评价体系的局限性

截至目前,对我国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表现主要还是基于企业社会责任或企业 ESG 的相关指标进行衡量的。但无论是企业社会责任还是 ESG 理念,均来自西方的传统话语体系,且通常仅针对上市公司。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及 ESG 表现的评价主要源于各大评级机构。然而,由于评级机构有其自身的价值导向,在评价过程中会因侧重点的不同,造成同一企业出现等级差异很大的现象,而这种不一致性也使得现有评级结果有待推敲(Chatterji 等,2016)^[15]。同时,以全球最大的 ESG 评级机构之一明晟(MSCI)为例,其对企业 ESG 评价的出发点是 ESG 之于企业经济价值的影响,而非企业对社会的影响(肖红军,2024)^[16]。这种评价方式是对企业社会责任和 ESG 理念的一种本末倒置,也是对我国共同富裕理念的一种狭义解读。因此,现有评价体系对企业的评级在本

质上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促进企业助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上升的引导和激励作用,同时也未能为我国企业推进共同富裕长效机制的建立提供足够的支持。

4. 现阶段下的行动方向暂无标准化方案

由于缺乏成体系的标准化行动指南,企业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出现行动方向不明确的问题。脱贫攻坚的结束意味着我国绝对贫困的消除,同时也意味着解决相对贫困成为推进共同富裕进程中新的奋斗目标。与绝对贫困相比,相对贫困是一个更加抽象且复杂的概念。随着相对贫困划分条件的变化,作为市场中创造经济价值的企业,以及实际参与企业运营的劳动者,也可能会陷入“贫”或者“困”的问题当中。因此,如何有效平衡企业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的关系成为了关键。面对新阶段的新目标和新挑战,我国企业不能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行为逻辑,而经验模式的缺乏,使得我国企业在处理“如何行动”和“怎么行动”等核心问题上陷入困境。然而,“摸着石头过河”往往意味着企业需要进行大量的实践和探索,这一过程伴随而来的试错成本会造成新的企业财务负担。因此,在没有新的标准化行动方案的情况下,众多企业选择继续通过现有方式,即企业帮扶、企业 ESG 等,助力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然而,这种状态会直接降低新阶段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效率,导致市场力量不能被充分发挥和释放,进而影响我国推动实现共同富裕的进程。

四、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概念框架

面对企业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及隐患,需要对我国现行的以鼓励企业通过承担社会责任为主的“单线”模式进行改革和创新。需要说明的是,对于现行方式的革新并不是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全盘否定。如上文所述,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有效推进共同富裕,但是其作用力度远远不足以支撑实现新发展阶段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一目标。为了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力量在推进共同富裕中的作用,本文从完善企业推进共同富裕长效常态化机制建设出发,基于《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强调的“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形成市场主导的有效投资内生增长机制”及“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点工作方向,提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企业价值投资范式,即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

1.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内涵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是企业应尽的义务,但是,“责任”通常意味着投入,而企业对于社会责任的投入又往往很难计算出具体的产出比。从企业角度而言,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方式推进共同富裕,更多地是一种企业对社会的单向投入,而这种无法估计产出的单向投入很难长期调动企业的主观能动性。为了更好的激发企业在解决社会问题,进而助力实现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首先需要让企业行为的出发点回到符合企业发展“自然规律”的位置。对于绝大多数企业而言,追求经济效益是其本质属性和核心目标之一。因此,相较于让企业通过让渡利润承担责任的方式参与社会建设,采用价值投资的方式让其挖掘社会潜在资源,并在利用社会资源创造自身价值的同时与社会福利一起增长,是一种更为良性且可持续的模式。

对于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来讲,其出发点是价值投资而非责任。投资强调的是经济回报,价值则是社会回报。价值投资在于能够实际帮助企业发现新的机遇和资源,助力企业成长和效益提升。而从社会的角度出发,虽然企业通过投资挖掘了社会资源,并利用市场机会进行商业盈利,但是企业投资行为也为市场中的资金流动注入了新的活力,而投资行为伴随着对社会潜

在资源的挖掘,也让资金能够流向原本被忽略的领域和地区。通过企业的价值投资行为,曾经被忽略的地区也能够因为资金的流入而得到一定的发展,曾经被忽略的行业领域也会因企业投资而得到成长。因此,相较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单向投入模式,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则是一种源于企业与社会的双向互动模式,通过企业与社会互动都能够平衡自身的需求,并得到相应的发展与成长,进而最大限度地助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同时,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通过“企业—社会”“社会—企业”的双向评估方式,最大程度上规避“本末倒置”的风险,确保我国资本向善投资能够落到实处。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作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新型的长期价值投资方式,其投资方式和投资策略并不会完全摒弃传统价值投资的框架,而是在传统的投资框架下进行改进、融合与完善,从而实现一种集成性创新。具体来讲,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对社会价值的挖掘仍然是现存的社会问题,如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乡村产业建设问题等,同时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面向的仍然是具体的产业和产品。但是,与传统的价值投资相比,由于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面向的是被忽略的领域和地区,因此,其在投资过程中可以依托的是中央和地方政府已创造出的资源和条件。纵观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进程,如何让政府力量和民间力量形成相辅相成的机制,是推动实现现代化的关键(马敏,2016)^[17]。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机制不同,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机制是在国家宏观调控下运行的,因此,在解决社会问题、创造社会价值的过程中,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具有强大的能量和影响力。事实上,为了更好地推动我国的城镇化进程并发展地区经济,我国政府在全国各地,特别是欠发达地区,建设了许多产业园区,并投资了许多产业项目。然而,由于我国部分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无法与政府资金投入强度相匹配,因此,出现了一定的产业项目闲置问题。国家审计署对国家重点贫困县审计所发现的问题,其中就涉及多项与产业闲置相关的问题。虽然这些产业项目遭到了闲置,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闲置项目完全失去了其经济价值。对于因发展水平错配而形成的闲置产业项目,企业可以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对其进行二次启动。对于依然具备使用条件但明显落后于市场发展的厂房、生产线等基础设施,企业可以通过升级改造对其进行盘活,进而实现既有资源的再利用,并在控制投资成本的前提下实现效益更大化。同时,作为一种在既有资产基础上的再创造投资,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可以有效规避由固定资产投入造成的风险。因此,相较于其他传统的长期投资方式,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风险相对更低。

此外,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作为一种企业与社会双向互动模式下的投资方式,其价值共创的模式会根据社会环境的不同而进行适应性改变,从而更好地与社会互动,形成企业与社会间的价值共创和价值增值。因此,在投资方向上,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对于项目投资的类型选择相对灵活,无论是生产制造类,还是商业服务类,抑或人力资本开发等非实体项目,均可作为价值投资的类别。同时,在投资策略上,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讲求的是与时俱进。以广东溢达纺织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一家劳动密集型企业,专职技术人才是其核心竞争力之一。为了让更多的产业工人留在公司,广东溢达采用了传统的投资人力资源的方法,但是在策略上并没有选择直接引进技术人才、提升员工工资或待遇的方式,而是选择在2015年与国家开放大学合作共建产教融合平台“溢达圆梦大学”,通过提升员工学历和技能的方式,促进企业技术人才比例上升,并实现“留得住人”的投资目标。依托原有业务基础的价值投资,讲求的是“借力打力”式的融合发展。以新疆阿勒泰的哈纳斯乳业有限公司为例,作为一家新疆本土的乳制品企业,由于地理环境原因,原来主要面向自治区内的消费群体。随着我国文旅产业的发展,新疆阿

勒泰地区由于其优越的自然风光条件,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很大程度上带动了当地以乳品为原料的土特产的销售。同时,由于近年来短视频平台的兴起,游客的到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阿勒泰乳制品的网络知名度。在这一背景下,哈纳斯乳业有限公司选择在线下持续扩大生产规模和销售的同时,开辟官方的线上带货平台,从而更好地打开其产品市场,并带动当地乳制品产业链的发展。

综上所述,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是一种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长期价值投资模式,其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企业自身发展需求为出发点,以政府资源为依托,以发展模式创新为策略,以实现企业与社会价值共创为目的。

2. 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与西方话语体系下相关概念的区别与联系

如前文所述,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核心在于,通过企业的投资行为形成企业与社会可持续良性互动。事实上,在西方的话语体系下,Porter和Kramer(2011)^[18]提出了一种关注企业与社会关系,进而实现企业竞争力与社会价值同步提升的概念,即“共享价值”。那么,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与西方话语体系下共享价值的区别是什么?两者之间又是否存在联系?

(1)企业出发点和捕捉价值机会的方法不同。共享价值的出发点是企业通过发现和利用社会问题,以及解决社会问题的商业机会,创造企业价值增值和社会总价值提升的双赢局面。然而,正是由于共享价值是基于发现现有社会问题的潜在商业价值开展的,因此,采用共享价值范式的企业,其必须要面对的两个问题是,如何捕捉到适合企业且对企业价值增值有益的社会问题,以及如何筛选出最符合企业参与解决的社会问题。如果企业对社会问题捕捉错误,或者对社会问题的商业价值评估出现了偏误,那么就有可能会对企业价值和企业的成长性造成不可逆转的负面影响。同时,被打破的企业与社会基于共享价值理念下形成的可持续发展模式也会使得社会现存问题无法得到有效解决,影响社会整体福利水平的提升。而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出发点是通过投资解决企业自身成长和发展问题,在这个过程中结合企业实际情况挖掘出现存社会问题的商业价值,并依托政府已有资源实现社会问题的解决,从而形成企业与社会共创价值的模式。也就是说,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是在“价值共创”的前提下进行“共享价值”。因此,从有利于企业发展和增值的角度出发,相比于传统的“共享价值”投资,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是一种风险更低且更为经济的价值投资。

(2)概念和理念不同。共享价值的概念是建立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而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是服务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一种企业投资范式。相较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主要依赖于市场自身的调节,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的经济体制,而“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使得我国的市场经济是有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正是由于社会体制的不同,使得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和共享价值在概念与理念上有天然的差异。由于共享价值概念本身缺乏道德支柱,因此,在市场经济背景下,共享价值范式的运行很大程度会陷入企业过分追求商业价值、但社会问题本身难以得到妥善解决的困境。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本身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运行逻辑“内嵌”了“四项基本原则”,这奠定了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价值核心,使得企业通过价值投资参与推进实现共同富裕目标这一方式能够有效平衡企业逐利与社会目标之间的关系,确保了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合法性、道德性和有效性。

(3)企业与社会“双赢”关系处理方式的不同。共享价值理念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以

企业挖掘社会问题隐含的商业价值为联系桥梁的。然而,当企业无法通过解决社会问题有效地创造出经济价值时,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共享关系就会断开,而双赢的局面也会被打破。而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逻辑下,企业是通过自身成长与发展的方式参与到社会问题的解决中,进而与社会产生联系与互动。因此,在这一范式下,企业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是在企业发展需求驱动下建立的。因此,相比于共享价值,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模式是更能够被广泛而可持续应用的企业与社会双赢的范式。

虽然,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和共享价值之间存在差异,但是,二者作为通过企业和社会良性互动达到多方受益的企业行为范式,两者之间也存在着紧密联系。首先,两个概念的定位是相似的。二者都是在基于不影响现有的企业“蛋糕”前提下,尝试为企业提供一种和社会共同构建更大“蛋糕”的行为范式。此外,两者希望达成的目标是一致的。虽然,二者的出发点不同,但都旨在通过让企业参与社会问题的解决,实现企业价值和社会福利的共同增长,完成企业与社会价值共创。

综上所述,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和西方话语体系下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共享价值是两个不同的但又存在一定联系的概念。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是共享价值在企业投资合理性、道德性、有效性和可持续性的一种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完善和超越,同时也是促进企业与社会形成价值共创、实现共同发展和共同进步的中国方案。

五、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行动方向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①。虽然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劳动力会从生产率较低的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部门转移(钱纳里,1988)^[19],即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中。但是,作为一个拥有超过14亿人口的超级大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进程不论推进到哪一个阶段,我国的乡村都仍会存在,不会消亡。只有把欠发达地区和“三农”问题解决好,才能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全面性和完整性,也才能真正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此,本文认为,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优先行动应关注促进欠发达地区发展、乡村振兴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为之做出贡献。

1. 企业投资于欠发达地区的行动逻辑

企业的成长通常伴随着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而当这些积累达到一定程度后,空间扩张就成为了企业发展过程中的必经之路(张筱娟和徐维祥,2020)^[20]。通过空间上的扩张,企业能够进一步拓宽市场、获取更多的资源和发展机遇,从而更好地提升企业自身的综合能力并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然而,根据实物期权理论,企业只有在其投资收益大于投资成本与期权价值之和的情况下才会选择投资(Bernanke,1983)^[21]。因此,企业扩张作为一种战略性的异地投资,其无论是采用以母公司为中心的由远及近的接触式扩张(Morrill,1968)^[22],还是采用基于发展需求以城市条件为衡量标准的等级式扩张(Hudson,1969)^[23],亦或是接触式与等级式扩张结合的方式进行扩张,首先要考虑的都是成本问题。

由于我国目前的市场一体化建设尚在完善阶段,因此市场分割问题形成的资本要素流动壁垒仍然存在。特别是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拥有了独立的资源分配权力,为了更好地保护地区内的经济和税收利益,地方政府往往会对本地企业和产业进行政策上的倾斜。当一个地区存在明显的地区保护政策时,非本地企业的进入成本就会变得相对高昂。同时,

① 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N].人民日报,2024-07-22。

作为一种嵌入在大的制度环境中的组织,企业的经营环境与地区制度环境息息相关。一个地区经济政策的稳定与否将直接决定企业投资的机会成本(贾倩等,2013)^[24],而一个地区经济政策的优劣与否,则将直接影响企业的生产和交易成本(宋渊洋和刘颢,2015)^[25]。此外,企业在进行多元化区域扩张时,通常会伴随经营环境复杂度的上升。为保证企业长期稳定的运营,管理层需要对不同区域的经济政治环境进行评估,并针对性地制定出适应于该地区的企业经营规范,造成企业决策成本上升。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发现,解决企业扩张成本问题的关键在于异地经营范围的选择。那么,企业是否能够找到这一类异地投资地区,该地区拥有一定未释放或尚未开发的区域红利,且这种红利能够有效增强企业竞争力并助力企业发展,同时,在这类地区,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在该地区发展的企业都有一定的政策优惠,且给予长期支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这类地区正是在健全推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背景下的欠发达地区。

相较于东部发达地区,西部欠发达地区在其市场结构和产业转型升级上都存在明显的短板。为了能够更快速地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内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欠发达地区的各级地方政府往往更倾向于通过招商引资的方式进行市场培育。因此,相比于向东部发达地区进行扩张,通过价值投资方式将经营范围拓展至西部欠发达地区,能够有效降低企业的进入成本。同时,随着我国市场的稳步发展,欠发达地区也将逐渐成为产品消费的重要市场。提前入驻欠发达地区,能够使企业在竞争新兴市场“蛋糕”的过程中占据先发优势,从而更好地实现“做大企业蛋糕”的目标。此外,完善区域协调发展机制,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均衡问题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完成的核心战略发展任务。为了更好地发挥市场在平衡区域发展的作用,中央及各级地方政府均对在我国欠发达地区进行投资的企业给予长期的政策优惠和财政支持。因此,从地区政策确定性的角度出发,企业面向欠发达地区的扩张风险是可控的,而中央和地方政府政策条件的一致性也会在在一定程度上有效降低企业的决策风险。

以春秋航空为例,由于成立时间较晚,且为民营独资企业,春秋航空的航线资源是相对有限的。同时,由于国内航班的飞行时段和飞行空间是有限的,而传统的国有三大航空公司在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形成了相对固定且庞大的航线网络,因此,在航线保有量上春秋航空并不具备优势。此外,各城市的机场属于相对稀缺资源,因此地方政府对航空公司的机场使用存在一定的本地保护倾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春秋航空在争取国内大城市及热门城市航线资源的压力和难度。然而,作为一家以运输载客为主营业务的航空公司,航线规模无疑是其企业的生命线。为了更好地市场中“活下来”,春秋航空将航线网络建设更多地投向了二线城市及我国的欠发达地区。自2014年起,春秋航空先后在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云南省等民航欠发达地区建设了共计37条对口协作航线,且多数航线为春秋航空的独飞航线。虽然在航线开辟之初,较少的客运需求导致盈利微薄,但政府的航线补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春秋航空的运营困难。随着我国文旅产业的兴起和民族“三交”工作的展开,欠发达地区也迎来了越来越多的游客,这些早期的微利航线也逐渐成为春秋航空的特色和盈利增长点。

2. 企业参与乡村振兴的行动逻辑

虽然乡村振兴的主导者是政府,但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往往伴随着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在过去的很多年里,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是生产要素从乡村到城镇的单向流动(张鑫和刘博睿,2019)^[26]。因此,在乡村振兴过程中,首先需要面对的一个关键性任务就是促进生产要素从城镇到乡村的回流,而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回流仅依靠政府力量是无法有效达成的。为更好地建立和完善生产要素在城乡间的平等交换和双向流动的长效机制,引入市场力

量显得尤为重要。具体来讲,相比于政府,市场在资源配置上具有一定的优势,如果企业投资于乡村,则可打破长期以来的生产要素从乡村到城镇的单项流动格局。同时,随着市场参与乡村建设的不断深入,乡村的资源将得到更为有效的开发和利用,乡村内部的有效市场也将得到极大程度的完善。这些都将有效地引导生产要素从城镇向乡村回流,并最终助力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间双向自由流动。也就是说,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和国家政策引导,为企业将其业务范围向我国乡村地区延伸提供了机遇。此外,通过深化乡村的市场化改革及乡村地区市场化经营模式的推广,将助力乡村资源向产业资本的转化,进而为培育乡村新产业新业态奠定有利的经济基础。

然而,企业投资在很大程度上是利益驱动的。那么,投资乡村是否能让企业在“利民”的同时“利己”呢?这个答案仍然是肯定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在农村。”根据经济学中经典的风险溢价理论,风险和收益往往是并行的。风险越大,收益也就越高。同理,一个地区的发展任务越繁重,其可供开发的资源也就更多。对于企业而言,投资该类地区也会为企业发展带来更多的机遇。

具体来说,虽然对乡村进行投资往往意味着企业需要面对投资规模大、投资成本高、回报周期长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我国目前的农村经济发展情况来看,农村仍存在大量的未被充分开发和利用的资源性及经营性资产(韩旭东等,2023)^[27]。而随着宏观经济周期的自然变动,乡村地区中的这些未被企业在现有经营模式下充分捕捉到的资源,将在未来成为企业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李兰翔等,2023)^[28]。因此,提前对乡村产业进行布局,盘活目前乡村地区中的沉睡资源,有利于高速发展和成长阶段的企业更好地拓展产业链条,完善产业结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一项长期战略,参与乡村振兴的企业可以获得相应的优惠政策。因此,相较传统的价值投资,企业通过推进共同富裕价值投资的方式将业务和产业链拓展至我国乡村地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更好地控制投后风险,从而更有效地实现企业价值增值。此外,通过面向乡村的投资,企业也能向社会传达出其作为市场核心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担当,以及努力建成高质量的中国式现代化企业的决心,从而更有效地提升其在市场中的形象和声誉。

以蜜雪冰城这一现制果茶连锁企业为例,其旗下以鲜柠檬为主要原材料的冰鲜柠檬水,由于味道清爽、价格亲民,广受消费者好评。根据蜜雪冰城2024年1月向港交所提交的招股说明书显示,仅在2023年的前九个自然月里,冰鲜柠檬水就已经卖出超9.13亿杯。而在巨大销售量的背后,是蜜雪冰城对新鲜柠檬原料持续且庞大的需求。面对稳定企业柠檬供应链这一问题,蜜雪冰城并没有选择将鲜果订单交给美国、新西兰等知名的国外农场,而是将发展目光投向了我国以柠檬种植为乡村主导产业的四川省安岳县。通过在安岳县当地投资建立专注柠檬收购、储藏、加工的全资子公司,蜜雪冰城完成了柠檬从田间到市场的直供产业链的搭建,在确保柠檬供应量的同时,成功地保证了产品品质并控制了生产成本。同时,柠檬直供的方式并与当地农户签订保价协议的方式也让安岳县农户减少了“中间商赚差价”的问题,让农户能够真正通过自身劳动获得更大的收益和报酬。

事实上,地属四川省的安岳县是我国最大的柠檬种植基地,柠檬产量常年保持在每年60万吨。然而,由于该县地势以丘陵为主,交通运输的不便和信息交流的不畅,制约了当地柠檬产业的发展,使得尽管地方政府对柠檬种植给予了大力支持,但仍无法让柠檬成为真正的地区名片。为了更好的宣传安岳柠檬,并提升企业自身的品牌效应,在每年柠檬的收获季,蜜雪冰城都会安排企业旗下的吉祥物“雪王”进行田间柠檬收购活动,并利用各短视频平台,通过“雪王”在田间地头的身影,生动且直观地向网友和消费者展示安岳柠檬从种植到采摘再到制成蜜雪冰城产品的全过程。

这一企业IP与短视频平台联动的宣传方式在提高了安岳柠檬曝光度的同时,也激发了更多消费者的购买欲,实现了企业与乡村的双赢和共富。

综上所述,企业通过推进共同富裕价值投资的方式参与乡村振兴并不是一个单向的付出行动,而是一个利民同时利己的“双赢”投资。通过面向乡村的价值投资,企业能够在投资过程中开发和利用现有运营模式下未捕获的资源。通过将资源转化为资本的方式,提升其竞争力和盈利水平。与此同时,企业在乡村地区的价值投资也为农户与企业的直接对接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让企业与乡村的“共富产业链”建设成为一种中国式现代化的乡村振兴方案。

3. 企业投资于公共服务的行动逻辑

一个地区公共服务的质量往往影响企业的投资办厂、劳动力和其他相关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关公共服务与劳动力迁移、劳动力成本之间的关系,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许多的相关研究,例如,Tiebout(1956)^[29]基于“用脚投票”理论指出,个体更倾向于向可以满足自身需求和偏好的地区迁移。Blomquist等(1988)^[30]基于1980年美国的相关数据发现劳动者会为其居住环境质量而让渡部分工资。Firmino等(2017)^[31]发现,在巴西劳动力会倾向于向公共服务质量更高的地区迁移。夏怡然和陆铭(2015)^[32]通过对中国2005年劳动力流动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劳动力流动和地区公共服务质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具体来讲,流动的劳动力倾向于向公共服务质量更优的地区迁移。潘士远等(2018)^[33]发现,地区生活舒适度的上升能有效提升一线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力。胡彬等(2023)^[34]指出,城市可以通过增加公共服务供给的方式吸引并引入更多的劳动力,从而改善当地的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关系。

从传统意义上来讲,提供和改善地区与城市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及质量的主体责任人是政府(陈浩和罗力菲,2022)^[35],但是由于政府的财政资源是有限的,且财政资金需支持的国民经济、社会活动是多样的,因此政府在进行资源分配的过程中可能会更优先对能得到短期回报的项目赋予更大的权重,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对地区公共服务的投入不足。同时,随着我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使得人口迁移的速度和数量都发生了相应变化。日益增多的频繁人口迁移也使得市场在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趋于多元化,如果政府一直采用固化的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很难适应我国城镇化推进带来的新的公共服务上需求并可能产生新的问题(刘尚希,2012)^[36]。以西部某村为例,为优化乡村环境、提升村民生活品质,该村于2023年完成了9000平方米的村组道路硬化工程。然而,由于不同行业部门对各类乡村建设项目采取分别管理、分别申报和分别实施,因此,随后水利部门在该村开展的老旧供水管网改造工作导致刚完成硬化的路面不得不再次被挖开。这一行为不但造成了不必要的财政资金浪费,同时对该村村民的日常生活也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因此,为了更好地提升我国的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完善区域间的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推动实现“以人为本”“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除了持续深化政府财政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改革外,引入社会资本,让市场主体参与到公共服务供给中并充分发挥其在项目谋划、统筹、集成方面的优势是十分必要的。然而,从投资收益角度来看,公共服务属于非显性收益领域(邓明,2013)^[37]。因此,对企业来讲,投资于公共服务供给不仅仅是另一种履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

企业参与公共服务供给,不仅是一种企业社会责任表现,更是一种能为企业成长和长期稳定可持续发展的价值投资。首先,企业通过参与所在地区的公共服务建设,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当地公共服务供给范围和提升质量,从而吸引流动劳动力向该地区迁移,打破当地固有的劳动供需关系和劳动力供给市场,通过增大该地区劳动力基本盘的方式,为降低企业用工成本进而缓解企业账面资金紧缩问题提供可能性。同时,对于身处劳动力短缺地区的企业来讲,通过投资地区公共服务带

动的劳动力迁移,能够助力企业度过“招工难”的阶段,让企业,特别是专注于实体经济的企业,能够利用其生产经营优势投入实物生产、流通,从而极大程度上保障企业长期成长性和抗金融风险的能力。

其次,根据既有研究,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对地区公共服务环境、公共服务设施以及地区居住环境均具有一定的偏好(Malecki和Bradbury,1992)^[38]。高人力资本的劳动者通常会更倾向于在迁移时选择具有较高公共服务质量的地区。同时,受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劳动力的迁移存在“孟母三迁”的现象(夏怡然和陆铭,2015)^[32],即地区的教育质量和教育环境能够直接决定我国劳动力的迁入和迁出。基于此,企业可以利用其自身优势,通过价值投资的方式与其所在地公共服务的提供方进行联动,并有针对性地建设吸引关键人才流入的公共服务项目,例如企业定点医疗、员工子女对口升学等,进而在控制劳动力成本的同时,获得更多的符合企业发展规划的高质量人才,为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劳动力基础。同时,人才作为现代化企业运营和发展的关键资源之一,企业良好的人才引进行为能够向市场传递出其积极发展的行动力,同时也能够有效提升投资者对企业未来发展的信心(金智和张心睿,2024)^[39],为企业融资提供一定的保障和便利。此外,地区内公共服务质量的提升有助于提升劳动力的幸福感(蔡庆丰等,2024)^[40],同时有助于劳动力工作效率的提升,进而提升企业的生产效率(孙伟增和何磊磊,2022)^[41]。因此,通过面向地区的公共服务价值投资,企业能够在提升其生产效率的同时提升员工的幸福感,进而完成“留得住人”这一目标。

以浙江省东阳市的花园集团为例,其在发展自身优势的生物医药、红木家具与木制品制造等产业的同时,也积极投资花园村的公共服务类项目。2006年,花园集团通过与缙云县田氏伤科医院投资共建二级甲等医院的方式,为花园村居民提供家门口就医的可能行。2016年,通过7亿元的投资,花园集团与浙江师范大学达成合作,共同建设了一所16年一贯制的外国语学校,让“高端”教育模式在花园村落地。截至目前,花园集团通过投资地区公共服务的方式,吸引了超过5万名高端人才及务工人员来到花园村就业。此外,通过升级改造村内的基础设施,花园集团于2023年将曾经属于贫困落后的花园村打造成了浙江省的5A级景区。蓬勃发展的旅游经济进一步提升了花园集团的知名度,特别是其红木产业的知名度。截至2023年年底,花园集团的营业收入已达到427亿元,名列我国民营500强企业的第308位。

综上所述,通过面向地区公共服务的价值投资,企业能够在投资过程中开发现有模式下未捕获的劳动力。通过升级和优化地区公共服务范畴和质量的方式,打破现有的地区劳动力供需关系,在劳动力成本可控的前提下吸引更多优质人才为企业服务,助力企业完成产业结构及产业链的优化和升级,从而增强企业活力及发展能力。此外,通过在公共服务领域的价值投资,企业也为劳动力本身提供了更优厚的生活环境和条件,让劳动者能够在工作中和生活中获得更高的成就感和幸福感,也让共同富裕的目标得以落地。

六、结论与讨论

如何以中国式现代化推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新征程上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十分重要的时代命题。本文提出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概念,对现有模式下企业推进共同富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反思。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从企业价值投资的角度出发,挖掘和探索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新范式,并提出了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概念框架和行动逻辑。

与传统西方话语体系下的企业社会责任、企业ESG概念不同的是,本文提出的面向共同富裕

的企业价值投资这一概念是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并顺应企业发展规律提出的,因此,其是在“内嵌”了社会主义基本价值观的前提下,从企业自身对发展和成长的需求出发,并结合推进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命题,通过企业自身投资行为搭建起与社会的双向互动关系,进而实现企业与社会的价值共创。为了更好地引导企业面向共同富裕目标进行价值投资,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优化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政策体系,并对面向欠发达地区和入驻乡村地区的企业给予持续的政策优惠。虽然乡村振兴是我国的国家战略且乡村拥有大量有待开发的资源,但是,我国乡村经济长期相对落后,且与城镇相比乡村的市场体量也相对较小,对于以创造更大短期经济价值为目标的企业来讲,投资乡村并不会被列为其投资的最优先级。为了让更多的企业了解乡村、投资乡村,政府应通过相关政策对企业进行引导。同时,通过对企业土地使用的政策性优惠以及对企业生产过程中的政策性补贴,让入驻乡村的企业愿意留在乡村,并将乡村产业融入企业整体的产业链条当中,从而让企业的价值投资更有效,也让乡村的资源得到有效利用,让乡村的产业结构得到升级。

第二,强化地方政府与企业公共服务建设方面的合作,并对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的企业给予引导及政策性倾斜。由于提供公共服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当企业进入到公共服务领域时,可能会因为其对这一领域不熟悉而造成反效果。因此,地方政府应对参与公共服务建设的企业提供一定的专业性指导,从而深化企业对公共服务的理解,同时,通过政企间基于公共服务建设的合作,让企业有目标地利用其自身资源和优势完善地区公共服务。此外,公共服务建设投资往往投入大回报时间长,为了让企业能够持续乐于参与地区公共服务建设,地方政府可以通过政策性采购、给予企业员工子女教育保障等政策性倾斜。

第三,提升企业对其社会价值的认知,增强企业对支持国家建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各级政府应积极完善市场公平竞争环境,破除中小企业进入国家级建设项目的壁垒,从而让企业在参与完成项目的过程中,提升其对社会价值的理解和认知,并形成企业推进共同富裕的内生动力。同时,通过开展和加强国有企业党建工作,进一步提高国有企业领导及员工对推动实现共同富裕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和认知,使其在后续企业经营和投资过程中能够有针对性地开展相关实践活动,使国有企业更加自觉地开展面向共同富裕的价值投资。

第四,建立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评价体系,鼓励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企业社会责任、ESG、共享价值等概念均来源于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实现共同富裕目标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有必要构建更加适当中国国情的学术话语体系。本文提出了一个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概念框架,初步讨论了企业面向欠发达地区、乡村振兴和公共服务开展价值投资的行动逻辑。然而,面向共同富裕的企业价值投资的理论内涵、评价指标以及完整的投资框架和标准化价值投资方案等还需进一步深入研究,并开展必要的更深度的定性与定量研究,从而深化这一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应用。

参考文献

- [1]黄群慧.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价值及实现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4):1-12.
- [2]司聪,任保平.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重点与路径[J].太原:经济问题,2024,(1):1-9,17.
- [3]韩保江,李志斌.中国式现代化:特征、挑战与路径[J].北京:管理世界,2022,(11):29-43.
- [4]季小妹,方雨豪,赵西君,聂智磊.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潜力和路径研究:以山东省制造业为例[J].北京:中国软科学,2024,(S1):223-230.
- [5]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六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 [6]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7]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 [8]李实.共同富裕的目标和实现路径选择[J].北京:经济研究,2021,(11):4-13.
- [9]李先军,黄速建.新中国70年企业扶贫历程回顾及其启示[J].重庆:改革,2019,(7):16-26.
- [10]国务院国资委党委.在脱贫攻坚中彰显国资央企使命担当[J].北京:求是,2021,(4):35-40.
- [11]卡尔·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M].北京:中国社科出版社,2009.
- [12]任保平,王子月.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重点、任务与路径[J].西安财经大学学报,2024,(1):3-11.
- [13]涂圣伟.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机衔接目标导向、重点领域与关键举措[J].北京:中国农村经济,2020,(8):2-12.
- [14]柏淑嫻,易志高,潘子成.企业参与脱贫攻坚能提升企业价值吗[J].厦门:中国经济问题,2023,(5):68-81.
- [15] Chatterji, A. K., R. Durand, and D. I. Levine et al. Do Ratings of Firms Converge? Implications for Managers, Investors and Strategy Researchers[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 (8): 1597-1614.
- [16]肖红军.关于ESG争议的研究进展[J].北京:经济学动态,2024,(3):145-160.
- [17]马敏.现代化的“中国道路”——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若干思考[J].北京:中国社会科学,2016,(9):28-40.
- [18] Porter, M. E., and M. R. Kramer. The Big Idea: Creating Shared Value. How to Reinvent Capitalism—and Unleash a Wave of Innovation and Growth[J].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011, 89, (1-2): 62-77.
- [19]霍利斯·钱纳里.发展的型式:1950-1970[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 [20]张筱娟,徐维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空间扩张特征、模式及其影响因素[J].南昌:企业经济,2020,(9):117-127.
- [21]Bernanke, B.S. Irreversibility, uncertainty, and cyclical investment[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83, 98, (1): 85-106.
- [22]Morrill, R.L. Waves of Spatial Diffusion[J].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1968, 8, (1): 1-18.
- [23]Hudson J.C. Diffusion in a Central Place System[J].Geographical Analysis, 1969, 1, (1): 45-58.
- [24]贾倩,孔祥,孙铮.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投资行为——基于省级地方官员变更的实证检验[J].上海:财经研究,2013,(2): 81-91.
- [25]宋渊洋,刘龔.中国各地区制度环境测量的最新进展与研究展望[J].北京:管理评论,2015,(2):3-12.
- [26]张鑫,刘博睿.乡村振兴应充分发挥民营企业作用[J].北京:环境经济,2019,(7):58-61.
- [27]韩旭东,李德阳,郑风田.政府、市场、农民“三位一体”乡村振兴机制探究——基于浙江省安吉县鲁家村的案例剖析[J].杨凌示范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52-61.
- [28]李兰翔,丁永坚,卢文俊.民营企业助力乡村振兴的驱动因素、潜在问题与对策建议[J].南京:江苏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23,(5):41-45.
- [29]Tiebout, C.M. A pure theory of local expenditures[J].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56, 64, (5): 416-424.
- [30]Blomquist, G. C., M. C. Berger, and J. P. Hoehn. New estimates of quality of life in urban area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8, 78, (1): 89-107.
- [31]Firmino, C. D. S. D., J. P. Elhorst, and R. D. M. Silveira Neto.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growth in a spatial panel of municipalities [J].Regional Studies, 2017, 51, (6): 894-908.
- [32]夏怡然,陆铭.城市间的“孟母三迁”——公共服务影响劳动力流向的经验研究[J].北京:管理世界,2015,(10):78-90.
- [33]潘士远,朱丹丹,徐恺.中国城市过大抑或过小?——基于劳动力配置效率的视角[J].北京:经济研究,2018,(9):68-82.
- [34]胡彬,王媛媛,仲崇阳.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与劳动力的空间配置——兼论地方财政压力的调节作用[J].北京:中国人口科学,2023,(6):34-49.
- [35]陈浩,罗力菲.财政能力、公共服务供给与流动人口居留意愿[J].济南: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2,(10):197-208.
- [36]刘尚希.我国城镇化对财政体制的“五大挑战”及对策思路[J].大连:地方财政研究,2012,(4):4-10.
- [37]邓明.财政支出、支出竞争与中国地区经济增长效率[J].北京:财贸经济,2013,(10):27-37.
- [38]Malecki, E. J., and S. L. Bradbury. R&D facilities and professional labour: labour force dynamics in high technology[J].Regional Studies, 1992, 26, (2): 123-136.
- [39]金智,张心睿.地方人才引进政策与企业成本管理决策[J].北京:世界经济,2024,(3):124-150.
- [40]蔡庆丰,吴冠琛,李东旭.安居才能乐业:保障房建设对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J].北京:世界经济,2024,(3):184-212.
- [41]孙伟增,何磊磊.职住分离、时间挤出与企业生产效率[J].北京:经济学(季刊),2022,(4):1147-1168.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Process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The Action Logic of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HI Yue, WANG Xiao-lin

(Institute for Six-Sector Economy,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s one of the essential requirements of socialism,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eature of accomplish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n recent years, how to promote and finally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solidly and effectively become one of the focus issues of discussion in various sectors of society, especially after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n academia, a large number of studies analyze the pathway of promoting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macroeconomy by focusing on the a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while whether to promote or achieve the common prosperity could not leave with a proactive government and an effective market. To figure out how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arket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turns its research perspective to the micro economy level. Specifically, this study considers whether and how to encourage Chinese firms to participate more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starts its research by analyzing the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reasons why Chinese firms are one of the important and essential parts of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Specifically, it points out that firms are the micro units that construct industries and the market. Therefore, how firms act would directly reflect the behaviors of industries and the market. Meanwhile, the actions and directions of firms would also affect the power of the market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In fact, during the past decades, Chinese firms have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and played a key role in accomplishing phase goals of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However, this study finds that along with the process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deepening, the phase goals of achiev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become increasingly complex, which makes the power of the existing paradigm of firms in promot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inadequate. After carefully deconstructing the existing paradigm by identifying the rationality, effectiveness and potential risks. It finds that the lack of self-driven motivation, the existence of operating risks, the restrictiveness of firm evaluation methods and the absence of standard action instruction to lead fir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and achieving common prosperity are the key dilemmas for the existing paradigm of firms. Trying to solve these dilemmas and improve the participation quality of firms in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this study proposes and constructs a new style of corporate value investment oriented towards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process of accomplishing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namely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investment.”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value investment method,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investment encourages firms to invest through its development needs based on the government resources and fusion the traditional and innovative approaches together, thereby forming a “self-interested” and “other-benefiting” development model.

Apart from the above mentioned, this study also discusses the methods and action logic of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investment. It points out that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investment could focus on (1) Digging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y existing in undeveloped regions and including the undeveloped regions as one of the choices of corporate expansion and development; (2) Digging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y of participating into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bing the existed operation activities with the resources from rural area; (3) Digging the potential opportunity to join into building the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and capturing elites for the enterprises through the population movement lead by the improvement of regional public services.

The marginal contributions of this study could be summarized as follows: (1) It extends the literature on promoting Chinese modernization through the level of behaviors of firms by analyzing the necessity, importance and effectiveness of firms that promote and achieve common prosperity. (2) It proposes and constructs a new corporate value investment method, which is called “corporate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value investment,” to overcome the problems of the existing paradigm of firms in promoting common prosperity. (3) It sheds light on improving the vitality and quality of corporate value investment in the socialist marke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common prosperity; rural revitalization; value investment of enterprises

JEL Classification: D21, G30, L22

DOI: 10.19616/j.cnki.bmj.2024.12.001

(责任编辑: 刘建丽)